

■新作聚焦 张柠长篇小说《春山谣》： 一段青春 三种视角

□曾念长

张柠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山谣》，在题材上涉及知青扎根农村这段特殊历史。如果用线性时间来还原故事，开头是这样的：春山小学的孩子们在春山公社的组织下，排成长队，跳着秧歌舞，敲锣打鼓迎接上海知青的到来。在小学生王力亮眼中，上海知青一言一行都特别新鲜，叫人心生好奇。这让我想到短篇小说《流动马戏团》，系出同一作者，写一个乡村少年听说马戏团要来罗镇演出，内心暗潮涌动，充满了期待和不安。当马戏团进村时，乡村少年做出一个决定，他要离家出走，去往一个遥远的地方。

把这两个作品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到一种相似的经验描述。面对外来事物，乡村少年睁大好奇的眼睛，内心开始骚动，甚至萌生新的行动力。在传统乡村社会，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，对外来事物特别好奇，是一种常见的生活真实。作家通过小说叙事，把这种生活真实呈现出来了，因此具有一种可靠的客观性品质。不过，这里我想说的，不是小说叙事的客观性，而是它的主观性。

在这两个作品中，作者都启用了儿童视角。儿童不像大人，看待世界时可以借助各种客观性尺度，又是结构，又是整体，又是模式，又是趋势。儿童打量这个世界，实际上只有一个尺度，就是心灵感受。这个感受到的事物，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客观性模样，一部分被放大，一部分被忽略，也有一部分是被无端想象出来的。世界因此变成了一种主观性存在。这种看待世界的尺度，却是最符合诗的原则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儿童视角是一种纯诗视角。我对《流动马戏团》这个小说印象深刻，很大原因是儿童视角贯穿得相当完美。马戏团的到来，与小镇里的许多人、事、物，并不存在事实逻辑关系，却通过小孩的诗意逻辑联结成一个整体。

在《春山谣》这个作品中，儿童视角再次被启用，若隐若现贯穿在整个叙事过程中。小说中主要写到了两个小孩子，一个是王力亮，一个是马欢笑。两个小孩对上海知青充满了好奇，最后将目光落在顾秋林身上。在成人眼中，顾秋林因家庭出身问题，需要在政治上进行冷处理，因此是一个边缘人物。但在小孩子眼中，顾秋林是个焦点。他有一头飘逸长发，会拉手风琴，特有文艺范儿。顾秋林单纯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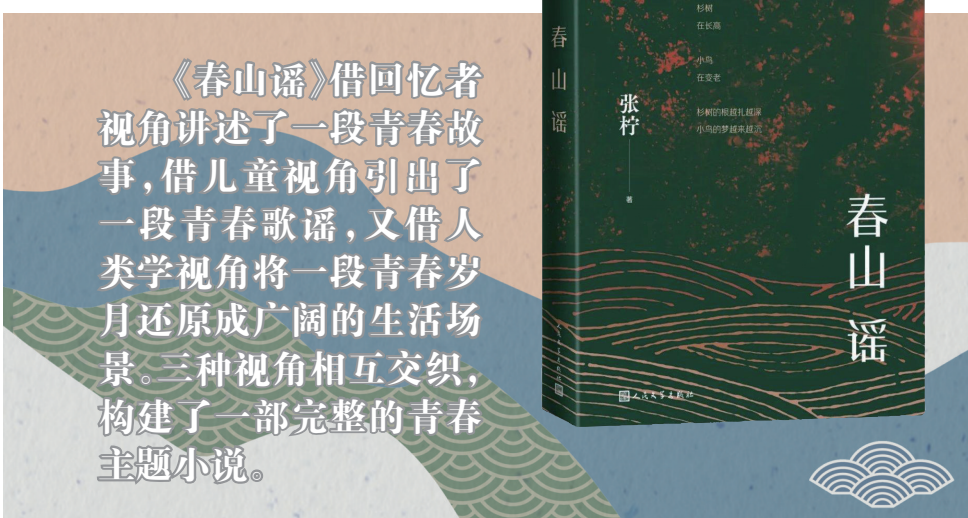
趣，又带有一点难以把握的神秘感，因此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中心人物。

作者借小孩子的眼光，把顾秋林带了出来，并在小说中对这个人物做了特殊安排。同其他上海知青一样，顾秋林在春山岭林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也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。这是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征服。但是顾秋林慢慢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，转而迷恋上了写诗，开启了主观世界的孤独之旅。他在劳动之余写下了《春山谣》系列诗篇。从故事的角度看，顾秋林所占戏份不多，显得有些平淡。一直到故事接近尾声时，戏剧性冲突放大了，顾秋林还是置身事外。仔细品味，我们却发现，顾秋林是一个藏得很深的中心人物。其他知青在故事层面提供了行动力，惟独顾秋林，在文学层面提供了感受力。正是顾秋林这个人物

的存在，知青扎根农村的故事被赋予了主观的深度，由此生成了一部具有纯诗品格的小说。作者将顾秋林设为小说的中心人物，与孩子们的眼光恰好重合。但是儿童视角在这部小说里相当隐蔽。张柠创作《春山谣》，没有像创作《流动马戏团》一样，将儿童视角设为显性视角。《春山谣》要处理的，是发生在大历史背景下的知青故事，涉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具有客观性。儿童当然也可以参与集体记忆的构建，不过儿童属于不可靠叙述者，儿童视角因其局部性和主观性，极少被作家用来驾驭大历史题材写作。因此作者选择了回忆者视角作为这部小说的显性视角，让活着的老知青来讲他们的青春故事。这个视角确认下来了，小说的宏观结构也就随之成型：在楔子部分，上海老知青陆伊回访春山岭，与王力亮、马欢笑等人相聚。在尾声部分，陆伊含泪告诉王力亮，拉手风琴的长发哥哥顾秋林因病离开人世了。中间部分则是他们对知青生活的漫长回忆，也是这部小说的主体。

从内在逻辑来看，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应该是陆伊。时过境迁之后，陆伊以亲历者身份回忆往事，便有了时间纵深感，像一条河流蜿蜒而来。这是一种史诗视角，具有全貌性和客观性。不过这种视角依然带有虚构属性，因为回忆者陆伊也是虚构出来的小说人物。

我们不难在细微处体会到，作者对陆伊这个人物是比较偏爱的。她是知青往事的可靠回忆者，同时也是顾秋林的恋人。不过作者没



《春山谣》借回忆者视角讲述了一段青春故事，借儿童视角引出了一段青春歌谣，又借人类学视角将一段青春岁月还原成广阔的生活场景。三种视角相互交织，构建了一部完整的青春主题小说。

有将陆伊设为故事主角。在故事层面，这个小说没有中心人物。作者给予每个人物的观照，几乎是平均用力的。于是我们发现，只有文学的中心人物，没有故事的中心人物，成了这个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。在多数情况下，长篇小说里的中心人物既是故事意义上的行动者，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思想者。张柠有意将二者分离开来，或许隐含了他对艺术真实的某种理解。那种集行动和思想于一身的小说人物，比如传统史诗和现代革命史诗里的英雄，是否也遮蔽了普通人的日常真实？在革命大历史背景下，众生不可避免卷入时代洪流之中，《春山谣》以一种平静笔调呈现出每一个人的细碎生活和成长体验。时代潮流波澜壮阔，一代人的青春却被吞没在命运的静水深流里。这是小说的惊人之处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——知青们响应和拥抱时代潮流，却无从知晓时代潮流将把自己带往哪里去。

这个悖论提醒我们，知青们对大时代的认知也是有限的。陆伊的回忆，充其量只是提供了置身其中的知青故事，却未必能准确讲述大历史逻辑。这种逻辑终究还是要用小说语言来讲述，与群体故事和个体心灵相衔接，转化成流动的生活场景。只是纯粹的文学眼光已显得局限了，文学之外的眼光成了一种必要的补充。这时候作者就启用了人类学视角。知青的政治生活充满了仪式感，与传统乡村习俗

的各种仪式相映成趣。这种富有仪式感的生活，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讲述，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《春山谣》对各种仪式化场景的描述，比如插秧、耕田、赶墟、闹洞房、安葬、贴标语、文艺汇演等等，都是带有人类学意味的。此外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，多少也受益于人类学的眼界。以往我们读革命历史题材小说，多是留下一种印象，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经济生活，只有思想生活没有物质生活。《春山谣》大大拓展了革命年代的生活边界，将经济生活描述得极其细致，又将物质生活描述得极其丰盛。这固然需要文学的细节呈现能力，却也少不了人类学在知识考古上的热情与功夫。张柠主攻文学，兼攻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旁科。读过其人类学专著《土地的黄昏》，如今再读小说《春山谣》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了。

《春山谣》借回忆者视角讲述了一段青春故事，借儿童视角引出了一段青春歌谣，又借人类学视角将一段青春岁月还原成广阔的生活场景。三种视角相互交织，构建了一部完整的青春主题小说。至此，我们不妨回到故事起点——春山小学的孩子们扭着秧歌舞，迎接上海知青以部队的整齐阵容出现在村路口。这个秧歌舞迎知青的场景，既是儿童视角与知青视角的最初交集，也是人类学视角的第一次试探发微，将一派热烈的民间狂欢引向历史深处的革命记忆。

■新作快评 杨晓升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 《清明》2021年第2期

偷换的人生和人性拷问

一直以来，作家杨晓升的写作既在描绘真人实事，又在书写难以尽述的人生。在这篇小说中，人物都有自己的宿命：王佳佳虽明白“纸包不住火”的道理，却陷入了对未来自杀的迷惘之中；罗翠翠虽通过相关部门查明了事实真相，却掉进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遗憾和深渊……通常，创作结束之后，这些人物的生活还要继续，加之道德的复杂性，就让这个故事的结束变成了另外一个新故事的开始。

读者之所以热爱无限接近真实的小说，是因为人对人性人情的嗜好浩瀚无边。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作家笔下女性人物的关系设置，王佳佳是罗翠翠的雇主且二人高中时期情同姐妹，王母罗春娟是罗翠翠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三个女人两代人的复杂关系让这个故事的矛盾冲突更复杂，同时也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。再加上一些阴差阳错的巧合：王佳佳的丈夫乔成林从家政服务中领回保姆罗翠翠，王的父亲王政发是家乡当地的派出所所长、罗春娟和罗翠翠同姓，以及罗翠翠报名参加成人高考，等等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让这个故事的发酵，以致最终演变成一个超越现实的思考：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究竟有多远？

当然，正如苏珊·桑塔格在其《虚构的艺术》里所言，“真相往往潜藏于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之中，这也为作家创作选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”。王罗夫妇如鱼成凤，王佳佳学习不争气，罗翠翠学习优异，罗翠翠父亲身患恶疾……王罗两家原生家庭的差异，本属生活常态，可一旦遇上高考，这平衡就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打破。换言之，当庄严而神圣的人才选拔制度被弄虚作假之人盯上，那么考生的前途、梦想，甚至命运，都有可能发生错位。所以，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，也就变成了实现高考公正的距离。面对社会现实，作家必须做出回应。杨晓升深知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因此在涉笔这个重大主题时，其选择的范围也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极易忽视的巨大效应。

基于真实事件的创作，需要在坚持事实的同时发现和构建一个好故事，并且漂亮地讲述它。在这篇小说中，作家为了让读者对自己的创作产生更强的信任感，在王佳佳与罗春娟这对母女

济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从山岭到海洋——赵德发访谈录》揭示了赵德发的精神密码，以及他创作40年来“经山历海”的心路历程。“从山岭到海洋”，既是赵德发成长轨迹图，具有地理意义的追溯，也是他的精神全景图，具有精神层面的探究。从《通腿儿》成名，到农民三部曲《继续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，再到《人类世》《经山海》等，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他的精神脉络——以农民与土地为圆心，以时代发展与变迁为半径，不断探索用“大历史眼光”回望农村，书写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。40年间，800万字，赵德发以文字放飞理想，可谓著作等身、成绩斐然。

一个人的文学创作，是单枪匹马投身精神战役，亦是孤注一掷“进窄门”与自己死磕。回望他的“经山历海”，出身莒南农村，14岁辍学在家，15岁偶然机会去小学教书，当了8年民办教师后才转为公办教师。当老师，进机关，做行政，无意中一本《山东文学》叩开了他的心门，毅然决然辞职，专注投身文学事业，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读书，他这一写就是40多年。似乎没有经历过退稿的作家是不完整的，赵德发也不例外，最初投稿的30万字小说“完璧归赵”，他愈挫愈勇，

包倬的小说对普通人生的艰难与坚韧有深刻体察，他对复杂人性的逼视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透视人生与人性的刀锋般的力度。最近，读到他近两年来的作品，大吃一惊，明显地感觉到，包倬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沉重的现实磨难这样的题材明显少了，包倬的笔变得轻盈，事件变得飘忽，而人物一个个变得特别，他们要么在人群中格格不入，因为某种特质而变得独特，或者与社会、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他们被这样的生活或者命运所缠绕，且将他们命名为孤独者。包倬的小说，集中地呈现了孤独者的狂欢。

《圣诞快乐》在一个酒吧中展开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情节。两个在网上聊天的年轻人终于在酒吧见面了。然而，当他们真正见面聊天时，这两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倾诉欲望里，全然将对方当成了一个倾听者。我们看到一个悲催而又哭笑不得的情景，两个人似乎很努力地想要展开一个交流，两个人，特别是“我”，又被自身的某种力量反复地拉回到思念故乡的喃喃自语般的梦寐里，仿佛被一种乡愁魔咒一般。另一方面，酒吧展开另一桌的故事，年轻人即兴爆发的一场闹剧。小说插入了男主角的行为。他很想对邻桌挨欺负的女孩施救，最终却止于心理想象。两条线索的并列和交叉设置很要命，它使两个行进的画面有了互为参照的性质。

《新婚快乐》写一对小夫妻摆婚宴，婚宴的场面和过程一如我们去参加一个随处可见的、寻常普通的街头婚宴，宴会、宾客、程序、两小夫妻，均没有故事，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，是婚宴上有一个来历不明的、喝得醉醺醺的老人。这个老人的故事并没有展开。小说只隐隐呈现了他来自女方的乡下，在婚礼上，他的行为举止有点失当，他的话被人拦住，他也被人拦住。这个没有展开故事的老人令人印象极其

■短评

“野心”与“正道”

□钟倩

如大地荒原上行走的歌者，孜孜不倦，废寝忘食，经历四个阶段创作：准备不足，懵懵懂懂；略微开窍，方向不明；倾尽积蓄，描画土地；突然“出轨”，写经验之外，毫无疑问，所有的经验都是血与泪的挥洒，都是汗水与智慧的结晶，他历经“不自觉的经验写作、自觉的经验写作、自觉的经验写作之外”，得出“经验写作是小说的康庄大道”，既要追求作品异质化，也要追求审美陌生化。

孤独的狂欢

——读包倬的小说近作 □蔡丽

深刻。当这篇中其他人物和情节逐渐模糊时，这个老人脱颖而出，以其鲜明的深刻感镌刻于记忆中。在一篇有点沉闷琐碎的小说里一个没有故事的面影模糊的人物，究竟以什么样的力量逐渐清晰于我的脑海？是格格不入。在一场婚礼中，这个老人处处显得不合时宜，与整个婚礼的气氛格格不入。一个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婚宴的亲戚，他预定了应该来表达祝福的。但是，这个老人从从头到尾，都以他的原身的身份标识，以他不可遏制的伤心，以他的固执地想要说什么、想要表达某种情绪的欲望来脱离这种氛围。作者没有清晰地说明这个老人来自何处，为何原因生气，有何心里话要说。这些全部省去。但读者却一次次地感知到他的逆反。一个个体，在某种群体状态中的格格不入，恰是我们生存，或说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痛点。生活现实尖锐的矛盾就这样冲破稀薄般的迟钝状态，冲击着读者的意识。

孤独总令人联想到无奈和凄凉。包倬似乎在将我们带进一个命运的悲愤交响曲。然而，在《鸟兽散》这部中篇里，我看到包倬那种激情洋溢的力挽狂澜，在一个看似城乡文明对峙的传统主题里，我们看到作家思考孤独的反向视角，对孤独命运进行的恢弘壮丽的逆转。《鸟兽散》中的少年，从北京读书回来，他放弃了回城市读书，而后参加工作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，以离家出走的决绝，遁入山中。包倬先是以极具抒情的语调来描写一个少年逐渐蜕变为野人的过程，

■创作谈

这是我的长篇三部曲的第二部，也是一个青春故事。《三城记》是子辈的青春故事，《春山谣》是父辈的青春故事。父子两代人，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，遭遇的问题截然不同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。他们的梦想天差地别，一代人渴望着倦鸟归林，另一代人试图上天入地。两相比较，饶有趣味。其中隐含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印记，隐含着命运在不同代际的身体和心灵上镌刻的印痕。在此仿用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篇的句式：青春都一样，命运各不同。

小说写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城市青年，离开父母和家乡，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春山岭的地方，跟那里的农民、回乡青年、村镇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一起生活。从熟悉的城市迁到陌生的村野，从吃饱喝足的日子到缺衣少食的日子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巨大的挑战。他们必须用汗水、眼泪以及身体中的每一点能量，与大自然的能量发生交换。他们吃的每一粒谷子和每一棵蔬菜，都是这种能量交换的结果。他们离开石头街道来到泥土和草地上，亲见谷子发芽，秧苗长成，稻花飘香，谷粒灌浆，稻子金黄。他们感受到了这种能量循环过程中蕴含的道理，不是书本上的道理，是镌写在大地和泥土上的生命的道理。他们也尝到了劳累和辛苦、孤独和悲苦的滋味，看到爱恨情仇的生长消息，遇见了人的纯洁和愚昧，感受到了命运的侥幸和无奈。经过自然的或者诗的教导，也经过残酷的人心的历练，从五谷不分的懵懂少年，成长为自食其力的青年。

我想强调的是，《春山谣》写的不是那些来自大城市

的知识青年，还有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当地农民和回乡青年，还有机关公职人员、医生、教师等村镇小知识分子。农民和乡镇工作人员的故事篇幅不小，也激起了一波波叙事高潮。当地农民、回乡知青、公职人员，并不是顾秋林、陆伊、程南英等知识青年的陪衬和道具。他们携带的习俗、文化、生活、劳作经验，同样是我着墨很多的地方。通过他们，我试图复活20世纪70年代的某些历史场景和生活景观。所以，《春山谣》既可以说是青年的成长故事，也可以说是乡镇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故事，更是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里的农民遭遇陌生人和接受陌生文化的故事。三条故事线索扭结在一起，构成一幅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横断面的画卷。

作为那段渐渐被淡忘的历史的旁观者，我把亲眼目睹过的生活场景和经验，转换成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和艺术细节。回忆中的碎片图案，通过记忆组合起来，转换成小说中跳跃着的艺术情节。回忆和虚构互相催化，让春山岭的草儿长了出来，鸟儿飞了起来。一边是抽茧剥丝，一边是穿梭编织，逝去的青春在故事中得以复活。艺术劳动的整个过程，携带着欣喜和愉悦，也伴随着感伤和悲痛。除了感恩，别无言语。顺便预告，正在写作的《江东梦》，讲述的是顾明苗的祖辈的青春故事。

那么，赵德发的“道”是什么？他的正道上接传统文化精神血统，下续现实主义文化品格，与鲁迅《阿Q正传》、巴金《家》、曹雪芹《红楼梦》、王安忆《长恨歌》、张炜《古船》、李洱《应物兄》等文化精神一脉相承，拥有某种内在关联。他的小说所做的也是担荷这种传承重任，借用访谈录中他多次强调的一段话来说，“能够引起我最为持久、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，还是农民与土地，这是我的血质决定的。”他以大历史观为参照坐标，一边打破传统，一边平衡心灵，在大打破与平衡之间赓续某种文化薪火。如小说主人公吕吕的向往实践、慧慧的修行体悟、吴小蒿的吃苦耐劳，等等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他的真实内在镜像，映照出生命的悲欢与虚幻，也传递出“人生未完成”之修行的必须与虔诚。

回到吴小蒿，她之所以能够走上荧屏深受欢迎，正是源自赵德发的“野心”和“正道”，他塑造了一位新时代乡镇女干部的形象，讲述她放弃安逸环境，考入栖霞镇当副镇长，上任初碰钉子、吃白眼等，后来舍身忘我，接与村民打成一片视为自己的“挂心粮”，接二连三的细节引人情感共鸣，这些都是赵德发多年积累采掘而来的生活片段，因而接地气、沾露珠、有温度。

刻画了少年的决绝。尤其写他一步步地融入森林，和鸟兽对话，互相亲近的过程，作家写得充满神意。而当文明世界要毁掉森林时，包倬创造了一个恢弘壮丽的鸟兽之城而过的场面，把一场逃难写得电闪雷鸣轰轰烈烈。我们从看到一个作家的来历：这是一个来自尚火民族的作家，极具血性。这是一个对自然和山野抱有敬意的作家，鄙视文明世界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。

包倬的小说还启发我们，这些怪异的、神奇的、浓烈悲剧或悲壮的个人人生，只是一个开始，由此，我们可以撕开文明世界的一角，照一照人这个生物，探一探生活幽微复杂的洞窟。《老如少年》表面看去是一个日常惯见的农村留守老人悲凉度的故事，很现实，也很陈旧，但作者将它兜底翻转了。一群留守农村的孤独老人，一个无法出门的傻子青年，构建了两个层次的人物表现。这群老人先是感到伤心，因为他们被抛弃了，被子女漠视和抛弃的现实反照了这些老人的人生，使很多老人感到了活着的挣扎和努力是无意义的。接着，老人被孤独所包围。为对抗孤独的侵袭，老人们接受集体组织，开始学习写字，互相交流沟通，开始玩游戏。只有站在这个老来无依、老而无用的节点上，活着才会调转头来，生命的光芒熠熠生辉。这是作家进行的精彩的逆思考。

自我的抒情和表达在背后支撑着叙事。那么，不管是作家冲向现实的观察，还是向人性和生命的想象，在相当程度上，消耗着作家的勇气，这是一种心负重写作。包倬在探索人的同时，总是对自身灵魂和生命进行反复解剖。我希望包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，但同时我也希望他保持目前这样的理智、强韧，保持着目前凝视人生和生命时丰富、广阔的视界。

青春都一样，命运各不同

□张柠